

启蒙教育和启蒙老师

陈德昌

很长一段时期,我认为一个学龄前儿童,要改变自己的朦胧无知状态,需要老师教我知道以前不知道的东西,阳光、不同颜色、物体形状、花朵、集体游戏、唱歌、画画、礼貌、还有简单的计数等等。幼儿园老师帮我睁开眼睛,观察周围事物,学会发现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老师帮我从家庭生活过渡到集体生活,教我知道集体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规则。所以,幼儿园老师是我在人生起跑线上的启蒙老师。上了大学,生物学老师教我知道细胞以及人体基本结构和功能等,这些都是以前我不知道的东西。因此我认为,生物学老师是我医学的启蒙老师。

有那么几件事加深了我对启蒙老师的认识。那时,“文革”急风暴雨式斗争已经难以为继,曾宪九教授和我都还没有权利进入病房工作。一天,曾主任问我:“一个小小的胃溃疡,外科大夫为什么要做胃大部切除术?”由此,引起师生俩之间的一番对话。又有一天,主任问我:“为什么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里,外科只能治疗浅表的脓肿和外伤?”“现代外科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番对话引出了更多使我感兴趣的问题。对话不在教室内,是以随意、分次、不定期、不定点的方式继续下去。曾主任深信“外科学的历次重大突破都是由于基础医学的进展而得到促进的”,“没有外科基础科研,就不会有临床外科根本性的改革”(他主要指的是麻醉、失血、感染、休克、代谢等问题)。他不急于告诉我他在想什么,他更多的是提问,迫使我去寻找答案,或者承认自己答不上来了。

在教学医院做了十几年的住院大夫,我学习各种疾病以及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以为这就是学本领、做学问。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人们是怎么发现并且逐步认识这些疾病,探索各种治疗的?教科书上有些简短的、叙事式的记载,不足以引起我的注意。毕竟这些故事已成为历史。我们的前人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奇怪的、甚至荒诞的设想或者假设?有的被今天的科学证实是错误的而加以否定。为什么从古代外科发展为现代外科学,需要经历一千多年那么漫长的过程?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有一批先知先觉者,以他们的创新思维,推动学科的突破性进展?历史成为不中用的古董了吗?对今天外科学的发展,我们能从历史中获取什么教益呢?坦率地说,在进入协和医院以前,能够有机会和曾主任面对面地多次对话以前,对这些问题我没有认真地思索。每天都忙着解决眼前的医疗问题,每天都想接受新知识的灌输,就是不肯静下心来多问一个“为什么”。

老师不会马上发表意见。他经常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提出问题。他给学生思索的时间,引发学生表达自己的见解。作为学生,我总是根据自己既定的视野和已经拥有的初步认识,考虑老师提的问题。有时,老师提出的问题并不能短时间内在现实层面得到解决。他不埋怨现实中的诸多缺陷,而是带领同学们一起思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启蒙是师生两人之间的对话,需要磨合,不是强制性的,否则不成其为启蒙。我不紧张,不感到有压力,却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好玩”。我接受曾主任这种教导模式没有多少年,他病倒了,真是可惜。我之所以决定选择危重病医学作为我从事的新专业,完全缘于曾宪九教授的启蒙教育。说到底,启蒙教育是培养学生对客观事物产生兴趣和好奇心,启发创新思维。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教会学生知道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不等于传授知识。“知道”不等于拥有“知识”。

我从 1991 年起曾以协和医院名义与外科学杂志联合举办多届全国危重病医学学术会议。1996 年后又以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名义举办过多届全国会议。静下心来反思,作为会议组织者或报告人,我多半热衷于让各地同道们“知道”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缺乏给与会者们留时间去思索、去提出问题。研讨会较少有争论,本质上是一种灌注式继续教育,大家的头脑可能成为信息的跑马场。大家或有埋怨,却情不自禁地涌入陷阱,正像“围城”外的人要挤进去,“围城”里的人出不来一样。与我的老师相比,我是不肖的学生。今天的我们,或多或少地依然比较习惯于背书和牢记。且看 2012 年我国干细胞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三位,但缺乏创新。

曾宪九教授生前多次说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科学家头脑的临床医师。钱学森老先生晚年多次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个问题确实令人困惑。央视主持人张泉灵讲过一则故事:中日学校如何考“甲午海战”?中国的考题是“甲午海战”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老师总结 5 点,学生背熟,少答 1 点就扣分。日本学校怎么考学生的呢:了解“甲午海战”的历史之后,你认为日中之间还会有战争吗?谁会赢?你为什么这样判断?故事展示着两种培养方针,培养着两种人。国家进步之魂是教育。有好的老师,才有启蒙教育。在人生不同层次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启蒙老师。

(收稿日期:2013-03-11)

(本文编辑:李银平)